

有謂「人望高處、水向低流」，作為人，追求民主、自由、人權這些「高層次」的事物可謂與生俱來。不過這些與生俱來的事物已變得陳義過高，幸好在多次爭取民主、自由、人權的運動中曾出現 Be Water 這句口號。參與者或留意該次運動的人都會明白這句口號的意思，但時不與我，這句口號的實質意思只能是字面的意思，成了水，自然向低流。諷刺地，向低流反能擴闊視野，除了高層次的事物，讓人更留意到日常生活和尋常百姓的事物。或許香港的真諦不在於民主、自由、人權這些高層次的事物，而在於日常生活和尋常百姓的生活實踐。

「真諦」、「真相」、「真理」

說到香港的真諦，必須首先指出，在中文詞彙裏，無論是「真諦」、「真相」或「真理」的指稱都是相同的，也即是英文所說的“truth”。很可惜，中文詞彙雖然豐富，但在華人學術或文化圈裏，對「真諦」、「真相」或「真理」的探討還有待開始。本文另闢蹊徑，從上世紀其中一位最重要的思想家班雅明在 1925 年提交到法蘭克福大學德國語言及文化研究系的教授資格論文入手（德國學制要求有志在大學任教的人士，即使已取得博士學位，仍須另行寫一篇論文，稱為 habilitation thesis）。班雅明在論文第一章的方法學導論裏透過對柏拉圖的重新詮釋，說明應怎樣理解和對待「真諦」、「真相」或「真理」。

班雅明選擇了柏拉圖對話錄中最為人熟悉的《會飲篇》（*Symposium*）作為重新詮釋的對象。他認為對話錄的主旨在於說明「真理」是「美」的內容（Truth is the content of the beautiful），他又認為柏拉圖十分關心「真理」能否配得上「美」（Can truth do justice to the beautiful?）。我們在香港經常把真、善、美放在一起，但根據班雅明對柏拉圖的詮釋，「真理」一方面是「美」的內容，但又不一定配得上「美」，這是甚麼道理？

在重新詮釋柏拉圖之前，班雅明鄭重地指出知識的對象（object of knowledge）並非真理，因為知識一定是被擁有（to be had），真理則不然。他更滿有想像地說：為了自己的外表，也即是為了「美」，「真理」從其追求者（pursuer）和愛慕者（lover）逃跑，從前者逃跑是出於恐懼，從後者逃跑則出於焦慮，但只有後者才能體會「真理」並非除下神祕面紗後所顯示的，而是與其匹配的啟示（Truth is not an unveiling that destroys the mystery, but a revelation that does it justice.）。即是說對班雅明而言，柏拉圖的擔心未免過慮了，他更認同類似「情人眼裏出西施」的說法，「美」是主觀的，只能在眼見者的眼中出現（Beauty is in the eyes of the beholder）。班雅明十分清楚這樣說豈非墮入相對主義的深淵？在文章中，他自己也指出這點，因此他才滿有想像地說「真理」為了「美」而逃離追求者和愛慕者，前者是出於恐懼，因為追求者志在擁有。但既然只有愛慕者才能體會「真理」是與其匹配的啟

示，「真理」毋須逃離愛慕者。更何況逃跑是為了自己的面容，也即是為了「美」；而「真理」作為「美」的內容，在愛慕者之前可以自我啟示。

回到香港的真諦，以上的討論看似有點像學究，但面對當前香港的處境，絕對不能思想懶惰，更何況以上的討論甚有啟發。無論是選擇離開香港或留在香港的人，絕大多數是香港的愛慕者。班雅明指出知識可以透過提問而獲得，但「真理」有別於知識，不能透過提問，而必須靜待「真理」自行啟示。啟示離不開語言，如果說香港的真諦不在於自由、民主、人權這些高層次的事物，而在於日常生活和尋常百姓的生活，那麼香港真諦的自我啟示其實早已出現在我們每天都講的香港廣東話。

名字和命名

在繼續討論之前必須先解開不少人對語言的迷思。對於語言，最常見的迷思莫過於把語言當成與他人溝通的工具。那些主張普通話教學的人，必定會搬出普通話教學有利溝通的講法。但人其實必須在語言裏思考（think in language），而不是透過語言思考（think through language）。即是說，其實語言引導人的思考，更重要的是，「後巴別塔」的人類語言除了極為多元，某些概念或理念更只在個別語言裏出現。西歐國家因為都採用拉丁字母，因此可以互相借用自己語言裏沒有的概念或理念。

另一方面，不論是甚麼語言，都會有大量名字或名稱，而且命名(naming)的舉動更往往舉足輕重。班雅明年僅24歲時寫的文章〈論語言本體與人的語言〉(On Language as Such and on the Language of Man)便十分強調名字和命名有多重要。文中他指出既然聖經聲稱是啟示之作，必定會有關乎語言的見解。他以人被逐出伊甸園為例，吃禁果只不過是表徵，真正的問題是人想得到善與惡的知識。班雅明認為這是絕對的虛榮(vanity in its deepest sense)，因為在伊甸園裏，所有事物均由上帝創造，而上帝的創造全是好的，根本沒有惡這回事。惡是一個掉出語言的名稱(name steps outside of language)。班雅明又把「哲學之父」這榮譽嘉許於亞當身上，因為聖經記載亞當為伊甸園裏的事物逐一命名。對班雅明來說，亞當的舉動有重大的哲學意義，他的舉動說明在伊甸園裏，人毋須為語言的溝通表徵(communicative signification)煩惱。在〈論語言本體與人的語言〉一文裏，班雅明指出上帝的創造不外乎是命名，人的語言同樣有不少命名，因此人的語言原本參與上帝的創造語言。換言之，對班雅明來說，命名的舉動和名字有極之深遠的意義，甚至和真理關係密切。他在自己的教授資格論文裏呼應自己年輕時寫的〈論語言本體與人的語言〉，指出真理賴以生存的不是意圖或意義，二者均須在感官世界裏找到具體形態。真理依存的是「首先訂立感官世界本質的力量」，這種力量的唯一居所正是名字，而名字也是決定理念(idea)是否呈現的事物。班雅明更強調：

理念的賦予，並非主要存在於某種原初的語言之中，而更是在一種原初的聽覺或原初的感知之中；在那裏，詞語仍然保有其作為名稱的尊貴，未被知識的指稱功能所削弱。¹

對於不習慣把神學和哲學放在一起討論的讀者而言，上面的一段文字未免故弄玄虛，這卻是班雅明的風格，他年輕時寫的〈論語言本體與人的語言〉固然如此，要交去審批的教授資格論文也不例外，他最後寫的〈歷史概念命題〉更變本加厲（因此最艱深，也最有啟發）。班雅明這種風格卻不是標奇立異，恰好由於他把神學和哲學放在一起才能突顯名字和命名的重要。

香港廣東話

基於地理位置的關係，中國大陸在悠長的歷史裏，長期處於唯我獨尊的位置，鄰近國家紛紛效法中國，中文詞彙因而甚少音譯字詞。即使晚清年間中國被迫接觸西方世界，但對自身文化的評價，絲毫無減。面對西方社會的種種先進科技，晚清的士大夫竟然提出「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主張，以為單是學習人家的科技便足夠。

香港位處中國大陸的南方邊陲，同樣是基於地理位置，香港社會接觸西方世界時，完全毋須背負中國大陸文人沉重的文化包袱。更何況香港在超過個半世紀的時間裏

被英國殖民統治，雖然英國殖民統治者沒有刻意灌輸英國文化，但在英治底下，香港社會和西方文化的接觸是全方位的，就連日常生活和尋常百姓的層次也無可避免地接觸到西方文化。

香港的廣東話是日常生活和尋常百姓的用語，香港的廣東話有大量音譯的字詞，這是眾所周知的事；但好像還未有人提出這些音譯字詞並非來自文人，而是出於原初的聽覺（primal hearing）或原初的感知（primal perception），即來自我們直截了當地說的士、巴士，明顯是基於最初聽到的聲音。兩者都是西方傳來的新事物，中國大陸的文人出於要傳達知識而說計程車、公共汽車或公交車，硬要把這些西方傳來的事物中國化。香港廣東話裏的音譯字詞則完全忽視傳達知識，除了簡單直接之外，或許因為沒有傳達知識的包袱，出現不少巧妙的變化，像搭靚、咪錶、車𨋖、領𨋖、酒吧、磅重、過磅等，將個別音譯字配上另一中文字，成了新的用語。傳統社會十分穩定，無甚變化，也甚少出現新事物。現代社會則完全相反，複雜多變，新事物不斷湧現；香港廣東話以最初聽到的聲音，直接音譯外來的新事物後，迅速將接踵而至的新事物命名。不要看不起命名的作用。香港的樓宇絕大多數是高樓大廈，搭靚是日常生活裏不可或缺的。此外，現代社會的不少運動項目，如舉重、拳擊和賽馬，參賽的運動員和騎師都必須過磅或磅

重。比起普通話，香港廣東話更能助人適應現代社會的生活，這點也是主張普教中人士的嚴重盲點。

但香港廣東話最重要的意義在於提供新的意念讓尋常百姓能一展所長。茶餐廳是香港飲食文化的一大特色，經營茶餐廳的人士通常並非大富大貴，甚至只是一般小市民。茶餐廳和廣東式茶樓的最大分別在於前者必定設有水吧，負責水吧的員工，除了提供各式飲品，更負責製作各類三文治、多士或奄列這類西式食品，連早餐時段供應的沙嗲牛肉麪或炸菜肉絲米粉也是由水吧的員工負責。水吧是茶餐廳的靈魂，一間茶餐廳供應的奶茶往往是其招牌出品；更重要的是茶餐廳所以是茶餐廳，全因為水吧！像酒吧一樣，水吧同樣是將英文的 bar 音譯後再配上另一中文字而成的名字。而名字是「首先訂立感官世界本質的力量」的唯一居所。雖然酒吧和水吧二者都是將英文的 bar 音譯後再配上相關的中文字而成，但酒吧是來自西方的事物，水吧則是香港的尋常百姓見識過人家的事物而發展出來的地道事物。

同樣，的士和巴士是西方傳來的，但「紅的」和「綠的」則是香港獨有的名稱；「泥鯁的」和「八折的」更是香港地道的事物。另外，由巴士開始，香港的廣東話發展了小巴、旅遊巴、校巴和邨巴。無論是的士司機或各式巴士司機都屬勞苦階層，工作時間長之餘，入息卻有限。「泥鯁的」和「八折的」是的士司機嘗試增加收入的做法，前者

違反的士發牌的規定，但對乘客而言卻免除獨自承擔長程的車費。「八折的」則是一羣的士司機自發組成，專門接載需要乘搭長程的乘客。無論是「泥鯁的」或「八折的」都是為了長途乘客而存在，二者都是「訂立感官世界本質的力量」，這種力量的唯一居所是名字。旅遊巴、校巴和邨巴等名字清楚說明為何名字是「訂立感官世界本質的力量」的唯一居所。

所謂衣、食、住、行，都是生活的重要範疇。在一座現代大城市，人單靠自己兩條腿，能到達的地方十分有限，必須乘搭交通工具。巴士是城市的重要交通工具，但學童上學大多未能自行乘搭巴士，校巴因而應運而生。有趣的是，校巴並非由學校經營，但卻保證能接載學童準時抵達學校和回家，十分受家長歡迎。香港每間小學起碼有十輛、八輛這樣由私人經營的校巴。邨巴類似校巴，專門接載個別屋邨乘客到某地鐵站然後折返，可減輕繁忙時間巴士乘客的數量，跟校巴一樣是「訂立感官世界本質的力量」。這種力量寄居於名字，因為有了名字人們便可以理解名字庇護的力量。香港的廣東話直截了當地說的士和巴士，因而輕鬆地再說出旅遊巴、校巴和邨巴。就如「泥鯁的」和「八折的」是的士司機嘗試增加收入的做法；而校巴和邨巴也是香港社會因應特定的交通需要自行想到的解決辦法，政府方面只需稍作規管。